

女性
新视野
丛书



江苏人民出版社



媒介与性别

卜卫 著

鼓励男女两性自由发展
媒介应消解男女二元对立
女性不等于脆弱、温柔、性感
男性不等于勇敢、进取、智慧



媒介与性别

卜卫 著

鼓励男女两性自由发展
媒介应消解男女二元对立
女性不等于脆弱、温柔、性感
男性不等于勇敢、进取、智慧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与性别 / 卜卫著. —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10

(女性新视野丛书)

ISBN 7-214-03030-6

I. 媒... II. 卜... III. ①性别差异 - 影响 - 传播
媒介 - 研究②女性 - 作用 - 传播媒介 - 研究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9372 号

书 名	媒介与性别
著 者	卜 卫
责任编辑	张慕贞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南京中央路 165 号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pph.com http://www.book-wind.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11.5 插页 2
印 数	1—4 850 册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3030—6/G·996
定 价	18.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作者简介

卜卫，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媒介传播与青少年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媒介与儿童、传播效果、受众调查方法、互联网影响、社会科学成果评估等方面的研究。1995年开始媒介与性别研究。1991年以来，出版了《进入“地球村”——中国儿童与大众传播》、《媒介·人·现代化》（合著）、《社会科学成果评估》（合著）等论著；发表有关论文和调查报告约60篇。

出版说明

朋友,如果您在乎自己的生命质量,如果您留心周围男男女女的生存状态,如果您把重新审视自己的性别身份看作自我认知的重要前提,您就一定不会错过与女人的发展、与男女和谐相处、与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处境密切相关的这三套丛书:

“女性新热点丛书”

“女性新视野丛书”

“性别论坛”

在我国,自“五四运动”以来,甚至更早一些时候,自近代维新运动以来,“女性”及其“解放”和“发展”,一直是社会上的热门话题。中国的妇女问题同中国妇女解放一样,始终与民族、国家的命运紧紧纠缠在一起。

我们曾经以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妇女解放了,再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妇女问题。我们也曾以为,社会的发展必然带来妇女的发展,而妇女的解放和进

步也必然导致男人的解放乃至整个社会观念的革新。

其实不尽然。

在中国妇女全面走上社会整整半个世纪之际，在一个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反观妇女解放进程，再看今天的现实生活，我们发现：

——妇女走上社会并不等同于妇女解放，社会生活中反倒更多了妇女问题；

——社会发展不一定同时就是妇女的发展，它甚至可能以牺牲妇女的利益为代价；

——而妇女的进步也不意味着男人和社会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它们可能恰恰是以相反的形式作出“滞后”的选择。

所有这些出乎我们意料的现象，不仅困惑着女人，也困惑着当代社会中几乎所有的人——因为没有人能在与女人的隔绝中生活，也没有哪个男人能在对妇女发展的拒斥中成全自己的人生。女人当然更不例外，她必须在变化的世界中不断更新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在自我发展的行程中自觉推动社会发展，在完善“人”的意义上敦促男人的解放和进步。

面对新的问题，必须寻找新的答案，因此有了这三套书：

“女性新热点丛书”于1997年出台,正值全社会动员全面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突出了社会发展与妇女发展的矛盾。“妇女解放”像是失去了它原来赖以依托的背景,妇女问题一时触目,所谓“新热点”,即由此而出。这套书几乎全部出自当今正活跃在妇女学界的女性学者之手,她们将关注和同情的目光投向在社会改革中出现的女性“新生群体”(如“打工妹”)或“弱势群体”(如“单亲母亲”),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力图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理性的分析透视当代妇女问题,旨在警醒世人,召唤政策投入,对社会和对女人敲响双面警钟。

“女性新视野丛书”于1999年面世,恰逢世纪转换之中。所谓“新视野”,是想在正视“问题”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将女性以及与之相关的问题置于广阔的文化背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强化自我认识,鼓励自我成长。此书的出版正值“下岗”问题突出,这种新形势下,女性的自强自立已经不尽是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成为生存的必要条件。改变生存方式的同时,观念更新势在必行。曾经的靠国家、靠社会、靠单位、靠家庭、靠男人——都靠不住了,自助和互助反倒成为有可能尽快走出困境的捷径。怎样走出第一步?怎样在自食其力的基础上走得更远、在众多的压力下活得稍

微轻松一些？怎样将社会发展的强势转化为个人成长的优势？……这套丛书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性别论坛”企图在前两套书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是我们给新世纪的一份献礼，也是我们对新世纪的一种期待，拟于 2000 年推出。这里所谓“性别”，主要强调两性之间的平等对话，而不只是女性（或男性）的一家之言。生活在当代，男女两性在社会上需要合作，在精神上也需要沟通和交流——只有在交流的基础上达成新的理解，男女双方的自我认识才会有所提高；必得有所提高，才可能和谐相处，在现代与历史之间架起一座跨越“性沟”的桥梁。“论坛”因此打破一般论著“一言堂”的封闭式立论结构，一家言论之中，总有他人参与；对话、访谈融于其间，切着时代进程和思想发展的脉搏，尽可能及时反映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力图给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广阔思考空间，以应和我们这个已经开始走向多元的时代；打开窗户，迎接八面来风，交流信息和体验，提供多方位的思考，以期及时改善我们的生活质量。

我们的三套女性读物正陆续与读者见面。欢迎阅读，欢迎评论，欢迎提供新的选题和建议。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7 月

前 言

在我国,媒介与性别研究自 20 世纪 80 年代出现于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女性主义电影研究领域,但未引起传播学界的关注。尽管在 80 年代大众传播学研究已经进入中国,但直到 1994 年和 1995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学术刊物《新闻与传播研究》才开始出现有关论述和实证报告。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 NGO 的媒介论坛、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课题的设置、首都女记协“传媒监测网络”的成立、《中国妇女报》等媒体对性别研究成果的积极报道等,一起推动了我国的媒介与性别研究的发展。

我参与的第一个妇女与媒介研究,是 1994 年全国记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执行的联合国教科文课题“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但由于当时我还没有社会性别的概念,所以并不理解课题目的即“了解妇女发展需求”的意义,不明白“针对女性的培训”与性别平等的关系,只是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实证研究课题。

影响我正式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是参加 1995 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这个大会 NGO 论坛的 3000 多场专题研讨会中,有关大众传媒的专题研讨会约 70 个(根据英文会议资料统计)。在此期间,也举行了 24 次全体会议,其中有两次全体会议是关于大众传媒的讨论。根据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和非政府组织论坛的讨论,大会《行动纲领草案》提出了世界范围内 12 个重点关注领域,依其重要性排序为:贫困、教育、健康、暴力、武装冲突和其他形式的冲突、经济参与、分享权利和参与决策、国家和国家机制、人权、大众传媒、环境和发展、女童。大众传媒被列为最关切领域之一,列第十位。

参加这些论坛和会议,使我第一次意识到可以从妇女问题的角度来看传媒研究,即从媒介在妇女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中认识传媒研究,如:当妇女不仅作为受众,也作为传播主体进入传播领域时,她们所接触的媒介、她们可利用的媒介资源以及她们利用媒介的目标和方法;处于社会边缘的妇女群体如何利用传统媒体;媒介中的有关男女两性的刻板印象的表现特征、产生原因、克服方法以及对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影响;女新闻工作者在新闻媒体中的作用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互联网以及用电子邮件建立的网络是否能增长妇女利用信息的权利和能力;在社会中是否存在着性别信息沟以及如何认识它对妇女的影响;媒介创造了哪些影响妇女生活的文化;不同阶层的妇女在利用媒体信息和参与媒介信息制作方面有哪些障碍;媒介促进了还是限制了文化的多元化等。

这次大会后,我在一篇总结中为我国媒介建设和发展

提出了六项建议。

1. 通过社会性别培训提高女新闻工作者的女性意识,并加强女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技术方面的训练。

2. 在一些研究机构、媒体和 NGO 组织中建立媒介观察中心,定期调查电视广播节目、报纸、杂志、录像带等媒介的内容,并将调查结果向社会和媒体公布。

3. 研究媒介教育的问题,探讨适合中国国情的媒介教育的内容、目标和手段。培养公民信息处理的能力。

4. 关注农村的发展,增加对农村的信息传播和流通。

5. 在农村和其他地区,增加对传统媒介的投资,利用传统媒介促进农村发展。

6. 建立跨学科研究小组,研究高新技术如何通过改变信息交流方式改变社会的发展,以促进中国社会的性别平等。

这些建议已经与我原来的研究视角有所不同。

世妇会之后,我开始对妇女与媒介问题敏感起来。在一个国际研讨会上,讨论“中国家庭与大众传播”时,我特别关注电视广告对农村妇女的影响。1996 年参加《人民日报》女记者卢小飞作品研讨会时,我注意到,当大多数女记者都积极地去写“大题材”或主流题目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亚于男性时,卢小飞却一直关注处于边缘地带的妇女儿童(见本书“独特的视角,独特的风格”),我提出她的观察视角是“女性主义的”。其实当时我没有区分“女性视角”与“女性主义视角”,所以有人提出异议。这促使我去学习女性主义的东西。以后,我参加了许多研讨、学习和社会活动,包

括：东西方相遇小组、GAD(性别与发展)沙龙、社会性别培训协作者小组、传媒监测网络、有关妇女和女童发展的研讨会、“红凤工程”等，也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合作，主办了“媒介与性别”研讨班。在这些活动中，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广泛的讨论，我对女性主义有了较多的了解。

1996—1997年，我加入了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主持的“大众媒介中的女性形象研究”的课题组。最开始是与刘伯红合作研究中国电视广告。这是一项内容分析，原则上是定量研究。但是，设立何种指标进行量化统计，以及如何解释统计结果，就不完全是定量的了，研究者的价值观无疑在起作用。研究结果公布出来后，招致批评的恰恰是这种价值观。

首先，人们怀疑，这种研究有必要吗？这个问题牵涉到中国是否还存在性别不平等的问题。如果平等了，我们还在这“吹毛求疵”干嘛？不仅如此，还有反对之声，认为这种批评根本就是错误的，违反了男女天然的角色定制。从那以后，每作一个研究时，我都要解释两个基本问题：其一，男女的角色及性格不完全是天生的，也是后天的；其二，中国现实中存在着性别不平等。第二个问题比较好解释，因为只要列出事实和数据，就可以看出性别不平等。最难的是解释第一个问题，它与人们的一般看法是相对立的，而社会性别理论本身也是不完善的。比如，介绍广告研究时，不少媒介工作者就说，女人就是让人看的，我们有什么错？也有的观众说，“文革”中女人都像男人，现在女人都像女人了，有什么不好？难道女人像男人就好吗？我们都喜欢传统式的女人。“女人做贤妻良母有什么不好？”“提倡女人温柔漂

亮依赖男人有什么不好？难道‘文革’中的女强人就好吗？”等等。我觉得这些问题不是简单地与性别研究发生联系的，它是中国人理解性别角色的一个重要背景。这使我认识到，如果不考虑女强人、“文革”中女性形象、中国女性与国家的关系以及封建文化对女性性格的影响等问题，不解释这些问题背后的性别结构，中国的性别研究结果就不可能为社会所接受，也就不可能起到促进妇女进步和社会发展的作用。

我在研究过程中逐渐了解到，女性无论作为传播者、媒介中的形象还是受众，都受制于中国特有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的影响。这个环境最大的特点是，中国妇女的基本权利是共产党赋予的，不是妇女觉醒后自己一项一项争取来的。中国的妇女运动与中国革命密切地联系在一起。’95 NGO论坛时，外国妇女认为中国电影《红色娘子军》不是女性电影，因为没有女性视角，它表现的是一场男人领导的，为男人的革命。但在座的大多数中国妇女认为，只有参加中国革命，妇女才能获得解放。电影中的红莲曾嫁给“木头人”，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但参加革命后，她可以自由恋爱结婚，革命赋予了她独立自主婚姻的权利，红莲的翻身几乎成了中国妇女翻身解放的一个典型。封建制度和文化对妇女的压迫、解放后妇女权利的获得以及“半边天”思想的普及、“文革”中的“男女都一样”、改革开放后女性向传统文化的回归、报纸等大众媒介在市场化浪潮中开始放弃“刻板生硬态度”追求“可读性”、商业化对女性形象的利用以及’95世妇会后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中国性别与媒介研究的特殊环境。一方面我们看到国家政策是

提倡男女平等、保证男女同工同酬、支持提拔女干部、鼓励创办妇女报纸和广播电视妇女栏目、反对性别歧视等,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由于存在着社会性别盲点,妇女在不同领域受到不同程度的忽略,在媒介内外都存在封建文化、媒介市场化和媒介产品的商业化对女性的贬抑或歧视。而民间对媒介批评的抵制不仅来自社会性别盲点,也来自对“文革”的反感和痛恨。所以,应该结合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来探讨媒介与性别的问题。可以说,没有这些问题的讨论,就没有中国的媒介与性别研究。

由于媒介与性别研究是从西方引进的,所以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西方的影响。在中国进行性别研究,应当注意避免用中国的某些现象去套现成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有时我想,为克服这一点,是否应该需要更多的面向基层妇女的经验研究。2001年6月,我们在北京海淀区妇联作传播学培训,当我讲完大众传播、组织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基本特征后,一位海淀妇联干部问:“你还没说海淀台算不算大众媒介呢?”我意识到,在我的研究经验中,地方媒体如区级电视台、县以下广播网络、工厂的闭路电视等通常是被忽略的。同年8月,我们在云南妇联进行传播学手册评估时发现,基层妇女的媒介经验大都超乎我想像之外。她们说,手册中列举的媒体资源都是国家级资源、省级资源,但中国大部分人口在农村,这些资源她们不可能利用;不能用发行量和收视率作为媒体的衡量标准,这种市场化或商业化的标准与农村妇女无关。她们建议我们应该有更多针对农村人口的媒介研究,也就是本土化的研究。在我看来,这种本土化的研究比某种西方框架下的研究更具有客观性,因为它

是在中国背景下直接观察和解释事实,而不是摘取某些事实来符合某种框架或价值观。

研究中也常提到女性视角或社会性别视角,有人认为这是主观的表现,但我不以为然。女性视角或社会性别应该使我们看到原来看不到事实,应该使我们更加客观,而不应强调这部分事实而忽略其他相关事实。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科学领域的男性中心,我觉得目的不应该是代之以女性中心,这等于摘下了一副有色眼镜,又戴上另一副有色眼镜,颜色虽然不同了,从眼镜中看出去的世界总归是变了色的。性别研究,应该在社会性别视角的帮助下,摒弃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尽量还原事实的本来面貌,尽量追求研究的客观性。

由于媒介与性别研究所具有的对社会文化的挑战性,从学术界到社会,已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区分“学术研究”与“价值观争端”也是非常必要的。作为科学认识活动,社会科学研究的目的是发展科学理论而非信仰。它解决“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不能直接解决“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这后一类问题被称为“价值判断”或“价值观争端”。在这本书中,“理论与政策探讨”和“实证报告”大都是对事实的描述和解释,“媒介评论”则含有部分价值观争论。科学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价值观的影响,但作为研究者,我更重视“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其实,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多问题未得到关注。比如在“理论与政策探讨”中,下列问题仍未能涉及:(1)关于女性主义观点与媒介研究的关系;(2)女性主义方法论及其对媒介研究的影响;(3)北美或欧洲怎么处理禁止色情暴力与言

论自由的问题的;(4)为什么西方妇女运动要创造各种各样的“妇女报道指南”,其“指南”的主要内容及含义是什么等;(5)北美、南美国家是如何进行以“改变性别刻板印象”为中心的媒介教育的,他们的经验和教训是什么;(5)亚太地区传播与性别政策分析等;(6)北美地区和亚太地区妇女NGO是如何利用媒体促进性别平等的;(7)在中国的情境下如何看待外国理论和实践探索;(8)中国媒介制度如何解决性别议题;(9)中国传媒监测网络的作用等等。我认为这些问题的探讨将有助于发展中国的媒介与性别研究。这个领域中,中国农村妇女研究也一直是空白。本书的出版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媒介与性别》汇集了六年来我关于媒介与性别的研究结果。其中部分论述已发表过,在编入这本文集时又作了修改或补充。本书分为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理论与政策探讨”,分别论述了社会性别与传播学研究的关系、媒介中刻板印象的表现及形成机制、我国有关的性别与传播政策及其效果、媒介素养教育等性别与传播的问题。其中,“探讨中国妇女媒介的使命”一文在分析国际上“妇女替代性媒介”的基础上,讨论了我国妇女媒介资源的特征及意义。

第二单元“实证报告”,利用定量和定性方法描述和分析了媒介与性别的现实,内容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作为传播者的女性的发展现状与机会如何;第二,媒介中的女性形象如何——即中国电视妇女节目、《女友》杂志中的女性形象如何;第三,作为受众的女性如何使用媒介——即儿童

使用媒介是否呈现了性别分化以及这种分化对儿童有何影响等。

第三单元“媒介评论”，主要是对女记者作品的性别视角、媒介中两性形象的性别含义等问题的讨论。

在本书中，每一篇文章前，都附有一段文字，或说明研究的缘起及其意义，或提供了与研究主题有关的背景情况，以便于读者阅读。我也提供了他人对我文章的不同意见，以及我自己对以往研究的批评和反省，期望本书能形成一个讨论的和开放的空间。

我衷心感谢所有为我的媒介与性别研究作出过贡献的朋友，特别是熊蕾、卢小飞、黎星、黄庆、寿沅君、冯媛、蔡一平、郭艳秋、刘伯红、葛友俐、史静圆、郑新蓉、毕淑敏、张越、荒林、杜洁、周华山、李惠英、刘晓红、丹麦学者 Cecilia Milw-ertz、美国学者 Jennifer Troutner、Jan Engsberg 等人。六年来，我从思想上得到这些朋友的启发，在研究过程中得到这些朋友有力的支持和帮助，并从共同从事的媒介与性别的社会活动中，感受到合作的愉快。我也特别感谢美国圣地亚哥大学(UCSD)邀请我在2000年去做“媒介与性别研究”的访问学者，使我开阔了眼界，并更加重视研究中国本土的问题。另外对本书责任编辑张慕贞的耐心、理解和指导也表示深深的谢意。

对本书的不成熟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卜 卫

2001年7月20日